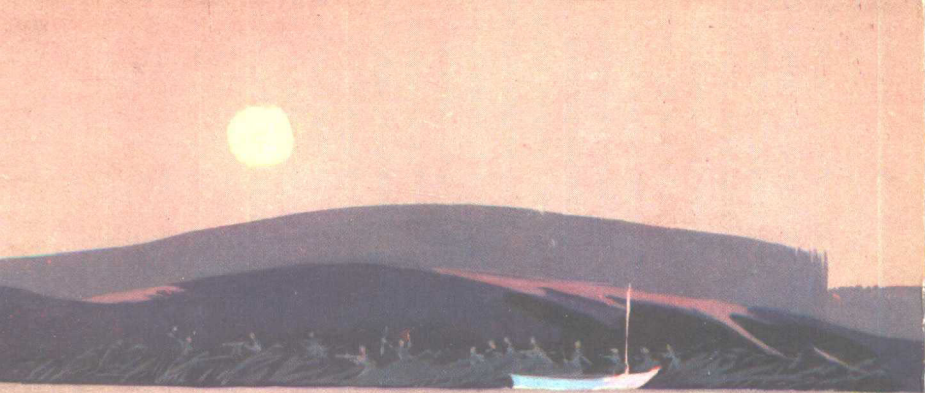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雾暗霞明

关沫南



雾 暗 霞 明

关 沫 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赵庭春

雾 暗 霞 明

关 沫 南

黑 龙 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-5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 8/16 · 插页 2 · 字数 154,000

1980 年 2 月第 1 版 198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76,8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298

定价：0.53 元

目 录

在炮队大街	1
险 境	22
一 面 坡	38
冰 上	53
李 炮	70
在镜泊湖边	80
太平川之夜	101
伏在马上的人	113
肇 源 烽 火	128
西 进	155
刘 桂 兰	172
赤 脚 的 人	184
黑 背 岭 下	199
狱 中 歌 声	212
海 兰 江	224

在炮队大街

那一年我才十岁，我们家住在哈尔滨新阳区二道街，父亲跑小买卖，母亲给人缝洗衣服。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宽绰，父亲只有一身旧西服，要出远门时才穿在身上。母亲省吃俭用，攒两个钱就来顾我。她总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。不过我穿的衣服上也常常打了补丁。

家里不富裕，可父亲偏爱交朋友，经常总有些认识他的人到我们家来。来得最多的有三个人：一个个子高高的，我和母亲背地里都叫他大个子，一个姓冯，戴眼镜，说话南方口音，还有一个姓张，个子也不矮，可是人很瘦。他们来了，有时就住在我们家里。和父亲一块出去一块回来，形影不离。我偶而进到他们屋里，见他们不是谈话，就是看报。除了他们几个，还有另外一些人来。一到这种时候，父亲就哄着让我到外面去玩，他把门关上不让我进去，不知道他们在屋里做些什么。

遇到生人，母亲不爱到他们屋里去。客人一走，她就不耐烦地问父亲。

“你们做啥呀？还把孩子轰出来！”

父亲冲她眯起眼睛，笑笑说：

“买卖人，还不是唠扯买卖事！”

可是谁知道父亲是做的什么买卖呢？他常常离家，到沈阳、大连、天津和上海去。他有个黄色手提箱，每逢他要出远门，总是一宿也不睡，翻过来调过去摆弄这个箱子。我不知道他都鼓捣些什么。早晨他上便所或是洗脸的时候，我有时就偷偷地把他的手提箱打开看看。每次我都很失望，里边除了他的几件旧衣服，就是毛巾、肥皂和牙具，还有摆在家里窗台上的成年他不看一眼的小说，封皮上的大美人都有了模样，也把它扔里两本。

我真纳闷，这些玩意儿他干嘛要成宿鼓捣它。

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做什么买卖，每逢父亲要走时，她总问：

“货呢？你带的甚么货？”

父亲平时就不爱说啥，这时总是低着头在桌上和床上拾掇东西，问急了，就说：

“货发了！”

有时也说：

“路上看吧，啥挣钱就捣腾啥！”

有一次，他临走向母亲要钱，母亲开始不肯给，后来还是给了。父亲笑起来，眼睛向母亲玩笑地挤弄着，他说：

“你等着吧，这回一定发财回来！”

母亲用刷子给他刷那身出远门时才穿的灰洋服。刷完，一边帮他往身上穿，一边说：

“自从日本鬼子来了，东西一天天涨价。找点事做很难，你看西屋老王又被裁了。你出一次门大老远的不容易，管怎的这回攒两个来家吧！”

说到这里，母亲拍拍我的头顶，指指我的脚和衣服说：

“你看，就这么个独生女，脚上破鞋打掌，衣服落着补丁，这回给孩子捎双鞋吧，买身衣服更好！”

沉了沉，她好象怕父亲办不到这些，又说：

“至少也给孩子带个洋娃娃回来，象哈尔滨秋林洋行那样的就行！”

父亲望着我，摸摸我的头顶，他那清亮的眼睛有点湿了，可是眼泪没有流出来。他顺手抱起我来，把他那因为熬夜弄得焦黄的脸，还有嘴上的胡茬子，都按在我的脸上，可劲亲我。亲完，一眼看见他那黄色手提箱，他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，眼里的泪没了，放出闪耀的光亮。当他提起手提箱，望着院里洗衣绳上晒的破东烂西走出家门时，他整个脸上，好象充满了希望的光辉。

每次父亲出门，我和母亲都抱着希望。可是，每次父亲都只带回很少一点钱。我的鞋子、衣服和洋娃娃都没有影。

父亲不是个不正经的人，母亲和我都是这样想。可我和母亲那时却又觉得，他好象不大顾家。有时他还向母亲要钱。

“给几个吧，买卖上用。你看，和朋友插伙的……”

母亲很生气，跟他瞪着眼，说他。有时不理他，多半天沉着脸站在那里。

“借你的还不成吗？将来还！”

父亲不生气，也不动地方，一直陪着笑脸要。到末了母亲没办法，瞅着父亲的样子，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只好从腰里掏出手巾包，谨慎地打开，把钱拿给父亲一些。

“哪，你这个不着‘尧兴’的（不学好的）！”

父亲走后，母亲又坐到地下的小板凳上，在洗衣盆里洗起来。她身旁放着一大堆破烂衣服，象永远也洗不完似的。那都是揽来的活计，又酸又臭。当母亲在洗衣板上光当光当地搓它时，洗衣盆里变黑绿了的脏水，往她的脸上和嘴里直进。她放下搓板，掀起围裙角到嘴上去擦，眼泪在眼角上转，止不住顺脸上就流下来。她嘟嘟囔囔地说：

“也不知是个甚么人，就算叫鬼迷心了，交这样一些朋友！”

我那时觉得，父亲真不替母亲想一想，母亲挣这几个钱多不容易。可是父亲把钱拿到手，就和他的朋友出去了，还显得挺忙的样子。到晚上回来，顶多给我们带些吃的，却没见过他做什么买卖。

“你是不是喝酒要钱哪？”

有几次母亲这样问他。

父亲说：“你看我是喝酒要钱的人吗？”

他真是好脾气，多咱和母亲说话都是那么耐心，脸上带着笑容。他说的也许是真话，因为母亲老早就让我留心，看看他们是不是出去喝酒赌钱。我注意了很久，从来没见过他们到附近的酒馆和饭馆去过。在家时不要说喝酒，进到他们屋连一次都没见他们吃过东西。我装着和他们说话，靠近前嗅嗅，每个人的嘴里都没有酒味。

母亲说，父亲和她刚结婚时，不是个不顾家的人，那时他住地方，吃劳金，挣了点钱就往家拿。现在母亲觉得，他一准是叫这三个朋友带累坏了。所以不管他们是不是在一起喝酒耍钱，反正母亲对这三个人有点讨厌，有点怨恨。他们来了逗弄我玩时，母亲一声也不吱，不屑答理他们。到后来他们住下时，都是父亲到厨房给他们弄吃的。

这一年，正是一九三二年，松花江涨水。日本鬼子和张景惠的北满特别区长官公署，不管老百姓死活，任凭大水淹进哈尔滨。那一天夜间，我们正睡觉，水就进屋了。等打开电灯一看，放在地上的鞋、小板凳，我玩的破木车、还有洗衣盆、洗衣板，早都叫水漂起来。要依父亲的主意，顾人要紧，他就想让母亲带着我先走。可是母亲舍不得那些破东烂西。她抱着我，急的直掉眼泪。正在这时，父亲的朋友老张、老冯和大个子都赶来了。他们手里拿着电棒，趟着水，一进门就说别着急，水势来的不猛。大个子照看我让我继续睡觉，父亲、母亲和老张、老冯几个人紧忙收拾东西。这一宿他们都没合眼。天刚亮，老张雇来一辆两马拉的大板车，把我们一家连人带东西，从没膝盖深的水里拉出来，送到了哈尔滨南岗军官街。

这里没淹，地势是哈尔滨最高的。很多难民带着孩子和东西，露宿在街头上。军官街消防队前小花园转圈堆满了东西，到晚上可场睡的都是人。大个子在他一个朋友那给我们借了间柁棚子，把我们安置下。这是铁路局的房子，柁棚子也很宽敞，收拾一下还不错。

母亲和我说：“这回亏得你这三位叔叔！”

从这以后，母亲对这三个人的印象才算好了点。背后也不许我管大个子叫大个子，得叫侯叔叔了。

我们住在这里，一直到松花江的大水退了，才搬回家去。这期间母亲活计少，我们的生活好象是靠三个叔叔帮助的。转年秋天，有一天父亲从街上回来说：

“明天搬家吧，叔叔帮我们在炮队街兑了个杂货铺！”

母亲乐的抱住了我，高兴地说：

“这回么，还象些个买卖人！”

二

我们搬到道里区炮队大街，买卖名叫同德永杂货铺，卖水酒、洋糖、点心和杂货。前边卖东西，后屋住家。小铺由我父亲和母亲照看，另外雇了个十七岁小伙计小郑，三天两头骑个自行车，出去买货办货。

杂货铺开起来，三个叔叔却不见了。有很长一个时期，谁也不到我们这来。母亲很感激他们的帮助，常常念叨。父亲听了一声也不响。

这时日子过得好了点，母亲心里有了底，总想给我和父亲添点衣服，平时吃点好的。可是父亲不答应，他说：

“咱们困难点不要紧，这钱还有用项，可不乱花！”

“甚么叫乱花，这叫乱花吗？”

母亲不高兴，和他吵，吵了也不顶用。他只允许给我用一些，他自己还是穿的“破衣罗索”的。

“这是怎回事，又交上甚么鬼朋友啦？”

母亲自言自语地纳闷。

但三个叔叔不见，父亲别的朋友也都没来。

过了有一年，我和母亲发觉，父亲又和门口一个卖烧饼的认识了，他们好象混的挺熟。

这个卖烧饼的中等个，嘴上留着黑胡子，脸上有点皱纹，象老头，又不象老头。他穿一件蓝小褂，黑布裤子，胳膊上挎个装烧饼的筐子。他隔几天来一次。一走到炮队大街，离挺老远就用他那山东腔调喊：

“卖烧饼，热火——烧饼！”

父亲一听见他的声音，就赶忙答对买主，把屋里的的事办好等着。他一来，父亲就出去买他的烧饼。父亲拿了钱给他，接过烧饼之后，他每次又都找些钱给父亲。父亲买了烧饼，总要拿到后屋之后，才给我吃。

父亲给我买烧饼，母亲高兴，我更高兴。有烧饼吃，别的事我都不去想。

可是慢慢我才注意到，父亲不光买来烧饼，有时还买来用纸包着的东西，那有点象大果子，父亲不给我吃。我想那里边的东西一定比烧饼更好吃，就留上心了。

有一回，他刚买进来，放在我们睡觉屋的条包上头。正好母亲喊他，他出去了。我赶紧搬了凳子上去，偷偷地打开看。谁知道不是吃的，是一卷子纸，上面写着很小很小的字，象油印的。我一声没响，赶紧放下就走了。

以后，我看父亲拿来这种纸卷，总是小心地不知把它藏到什么地方。这是做什么的呢？我觉着挺奇怪，就和母亲说了。母亲听了之后说：

“有这种事么？噢，这是做甚么的呢？”

她疑惑了几夭，没看出什么门道来。就问父亲：

“你从那个卖烧饼的手里拿来的纸卷，是干甚么的？”

父亲好象吓了一跳，连忙摆了一下手。看见伙计小郑没在屋，他才镇静了。怔怔地瞅了瞅母亲，又瞅瞅我，问道：

“谁说的？”

母亲望我一眼，把我吓得立时脸红了，我低下头。母亲没说是我告诉的，她说：

“我看见的！”

父亲知道母亲不认识字，他象有点放下心，装做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，笑笑说：

“没什么，是些包东西的纸！”

母亲眼珠转了转，象看透了父亲的心事。她小声地，但却是严厉地说：

“你可小心点，你若是干那种事——就是街上撒的，墙上贴的……”

父亲忙截断她的话问道：“甚么？”

母亲说：“传单！”

自从日本军队进了哈尔滨，街上没少断了传单。谁都说这是共产党干的。

父亲听母亲说了传单两个字，冲她直晃头。

“净胡扯！”他说。

母亲用手指头点划着父亲的脑袋说：

“若叫我知道了，我可不答应。我得去报官，把你抓去！”

她象吓唬父亲的样子。

母亲真能报官么？我有点替父亲担心。可是这天还没等我出去玩，母亲就把我单独叫进屋去，把嘴贴在我的耳朵上，小声说：

“你爸没啥事，你出去可千万啥也不要说，你若是乱说，日本人该把你爸抓去啦！”

我知道，母亲也恨日本人，还有那些给日本人干事的警察狗。他们多凶恶呀，到我们铺子来喝酒吃东西，拿烟卷，走时一个钱也不给。母亲一要，他们就拍着栏杆瞪眼骂人。

自从母亲听我说了父亲藏纸卷的事，她好象还疑惑着，断不定父亲是干啥。不过对父亲的举动她可留上心了。

父亲待柜伙小郑挺好，平时没事就教他认字，我们吃啥也给他吃啥。每到星期六，父亲都叫小郑回家去看看，星期日再来。小郑家有个老妈，住在偏脸子小地堡。

到了星期六晚上，铺子里就父亲、母亲和我睡觉，很静。父亲一到这天夜里，总要出去一两次。起先母亲以为他是上便所，或者因为小郑不在，夜间到前屋看店房的。结果后来才知道，都不是。

一个星期六的半夜，我正睡着，冷丁醒来，觉得房子里没人了。母亲不在我身旁，父亲也不见了。窗子上有月光照着，我溜下地走出来。走到前屋门口，柜房很黑，没有人。我很害怕，赶紧转回来。我想母亲一定是上后院便所了，就从过道往后院去。过道头上是我家的厨房，我走到那儿，看见门开着。厨房的窗子上也有月光，我一下看见了母亲。她正伏在厨房的地板上，不知在做什么。我走到她身旁去，正

要喊她，她一哆嗦，我们互相都吓了一跳。她看见是我，赶紧用手堵住我的嘴，把我拉到她身旁，直劲摸索我的头发。

我挨着她，和她一样蹲下身去。我看见厨房地窖下面有灯光。从地窖盖的裂缝里可以看清，下面点着洋蜡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地窖，伏天放东西的，现在有多半边空着。里面正有两个人，在靠墙放着一个木头案子上，油印着什么。我把眼睛贴近裂缝，这回才看出一个是父亲，另外那个是老张叔叔。老张叔叔很久不见了，今晚不知怎回事跑到我们地窖里来。他一下一下在推油印滚，父亲轻轻地，一张一张掀那油印好的字纸。

一会，老张叔叔看看他的手表，说：

“省委给各游击队的指示，今天就印到这，下星期六我来帮你抄那个东西。你这老交通，又得跑一趟上海局了。这回省委要转送党中央一个全面汇报的材料！”

说完，他们停止油印，整理那印好的纸张。母亲赶紧拉着我，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厨房。回到床上，她把我按倒，让我闭上眼睛，不许我说一句话。等父亲进来时，我们都装做仍然睡得很好的样子。

第二天没人时，我以为母亲一定会和父亲吵的。可是没有。父亲一夜没睡，脸色焦黄，颧骨显得更高了，眼里布着血丝。他的头发和胡子很长时间没理，白天叫铺子里的活一累，他穿着那身破衣服，再咳上两声，真象一个囚犯。母亲瞅着他的样子，直皱眉头。我想母亲一定是想到他的肺病，担心起他的身体。

在这一星期里，母亲嘱咐我两次，叫我千万不要把看到

听到的事讲出去。她自己象不知道的样子，也没有和父亲提。不过她可是不大说笑了，似乎总在想心事。

到了这个星期六的夜里，我和母亲哪里能睡得着啊。我虽然没有再跟出去看，但父亲是怎么出去怎么回来的，我和母亲睁着眼，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等父亲回来躺到床上，母亲说话了：“你把他送走啦？”

“谁？”父亲见母亲没睡，有点发怔。

“就是她张叔叔！”

“他没来呀！”父亲的声音都有点变了。

“他来帮你抄的东西抄完了吧？”

母亲笑着问，一翻身坐起来。父亲听见这句话不吱声了。

屋子里沉默着。隔了半天，母亲说：

“我说仲为呀，”仲为是我父亲的名字，“你不为我想，还不为孩子想想吗，干这种事该多危险哪！”

父亲还是不吱声，装做睡着的样子。母亲接着说：

“你们摆弄那些纸片子，可有甚么用。凭几张纸片子，能把鬼子治出去呀，还是咋的？”

父亲知道母亲的脾气，他沉默着，呆半天才说：

“行了，别说啦。明天晚上，她张叔叔来咱家吃饭，我们哥俩就要分开啦。他要走了，再也不回这啦，我后天去上海搞腾买卖，我们以后不干这个了！”

母亲就是这种脾气，她说是说，可心还是好的。第二天听说张叔叔晚上要来吃饭，她老早就去市场买肉，回来一个人在厨房包起饺子。吃午饭时，她在饭桌上和父亲说：

“你看你们这些人，一件衬衣穿几夏也不换，老张那件白

衬衣也变黄的啦，现在他要走，是不是买两件送他？”

父亲看看屋里没人，说：

“有钱还留着救国呢！老张也俭省惯了，一定不能要。给他带几个钱吧，路上工作还能用！”

父亲把左拳两指伸开，比成一个手枪的样子说：

“再说他是下乡去干这个，穿着新衬衫路上可不便。你不是说小鬼子不是不怕纸片吗，这回让他尝尝老张的这个吧！”

母亲和我听了，都沉默起来，半天说不出什么。

是呀，现在我们才明白，为啥父亲从前不大往家拿钱，有时还管母亲要，为啥开了买卖，他宁肯穿得破衣罗索，也舍不得花几个。他们省吃俭用，都不是为了自己呀！

这天晚上，张叔叔果然到我们家来，喝的酒，吃的饺子。

他问我：“跟我去吧，上大山里，看大树，象海洋那样的大森林！”

我晃了晃头，我舍不得母亲，再说我还在道里十四道街第十六小学念书呢！

母亲这晚待张叔叔也很亲切，她没提一句昨天晚上劝父亲那样的话。因为在父亲他们这样人的面前，谁都会觉得，太懦弱的话是说不出的。我在一边瞅着他们，只觉得父亲和张叔叔照在墙上的影子，是那么高大。好象只因为有了他们，这时我才想到活着做个中国人，将来还会有希望，不能老叫人欺侮似的。

父亲和张叔叔分开时，他们互相紧紧地抱着，握着手说：

“再见再见，希望彼此胜利，互相听到好消息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父亲又提着他的手提箱上上海了。这回我

才清楚，父亲为啥一出远门时，就成宿鼓捣他的箱子。他做的真周密呀，我在他的箱子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到现在我才清楚，他为啥临走时那样亲我了。这回我没有看他的箱子，却紧紧抱着他的头，亲他的脸。

在父亲没回来的那些夜晚，母亲和我都不能很好地入睡。我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。母亲大概更多地是担心父亲的危险，我却想着：上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？那里有没有共产党？父亲是不是去找共产党的？张叔叔说他是老交通，甚么是老交通呢？他回来能够告诉给我些什么吗？

父亲回来没跟我讲共产党的事。他说上海有个电影女明星叫阮玲玉，她叫旧社会逼的自杀了。父亲到上海时，正赶上她出殡。父亲就给我讲起他看到的阮玲玉出殡的情景。

父亲虽然和母亲说他不再干什么了，可是我们都没有相信。不久，果然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。有一天，那个有一年多不见的大个子侯叔叔，突然到我们家来。父亲叫我跟他一起出去，说：

“去，帮你叔叔去取取东西！”

侯叔叔领我走到中央大街，坐上小汽车向香坊区跑去。进了香坊区，半路下车走起来。到一个院，他让我站在门口等他。他走进院去，不一会拿出一个包袱交给我，让我拿着。他离我很远在前面走，让我在后面跟着。半路上我们又上了小汽车，一到道里，他就叫我自己中途下车，把包拿回家交给父亲。

类似这样的事，我帮他们做了好几次。而母亲呢，也渐渐地习惯了，默认了，不再对父亲说什么。因为这些年她也